

财经聚焦·展望 2015

刚刚过去的2014年,A股告别持续多年的低迷,沪指录得过半涨幅。这波令人兴奋的行情,也为新一年股市构建了想象空间。

展望2015年,在外部环境喜忧参半的背景下,A股机遇与风险并存。而在众多业界人士看来,2015年的A股能否成就期待中一轮“有质量的牛市”,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仍是最关键的驱动因素。

新一年A股:期待“有质量的牛市”

机遇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预期乐观

尽管201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大多数市场人士仍对A股市场抱有乐观预期。在他们看来,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或催化“结构性牛市”。

博时基金研究部副总经理蔡斌视“改革+产业升级”为2015年A股的主基调。他表示,在增速呈现缓降趋稳态势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在提升,结构在改善。

“创新而非要素投入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起飞的核心动力。”蔡斌说,2015年国家政策方向、经济发展趋势的可见性增强,将有利于提升A股投资者对经济和市场的信心。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周宇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表示,2015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偏向宽松的格局概率较高,经济有望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企业毛利率有望改善,辅之以加息、减税等措施,企业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改善。这都有助于为股票市场提供相对良好的环境。

国泰君安证券分析称,当前股市与1996年至2001年类似,属于分母驱动的“改革牛”,其驱动逻辑来自经济软着陆、估值偏低、利率下降、政策宽松、改革提升风险偏好、金融风险“拆弹”、政策呵护以推动直接投资。

风险 资产价格泡沫积聚 压力仍存

刚刚过去的2014年,沪深股市分别实现52.87%和35.62%的累计涨幅。多年“熊冠全球”的中国股市,一跃成为世界范围内最“牛”的市场。

股市显现的赚钱效应,令各路资金纷至沓来。继创下逾1.26万亿元的史上最大单



期待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日成交纪录之后,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年末突破万亿元大关,也使得这波行情被称为“杠杆上的牛市”。

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断积聚,或将成为2015年A股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民生证券认为,短期市场最大的风险来自监管层面临的压力。一方面,实体经济下行和资产价格泡沫快速上升,掣肘了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另一方面,非理性繁荣透支了未来市场的上行空间。中期来看,最大的风险或来源于实体经济再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的融资利率快速上升。

华鑫证券投资总监仇彦英则表示,从最近两年A股的表现来看,股市对政策的依

赖度有增无减。尤其是2014年11月下旬以来的这波行情,因有大量资金通过加杠杆方式入场,从而带有强烈的投机成分。

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短期内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预期难有大幅提升。而在基本面未获明显改善的背景下,一旦投资者形成“落袋为安”的共同心理,市场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市场 改革是关键驱动因素 概念扩容

在股指快速拉升的同时,市场热点的频繁切换,也让2014年的中国股民难免“满

仓踏空”的尴尬。A股能真正显现财富效应,成为他们对新一年市场的共同期待。

而在众多业界人士看来,2015年的A股能否成就一轮“有质量的牛市”,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仍是最关键的驱动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相继出台的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司法体制、土地流转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将在2015年获得进一步贯彻落实。与此同时,更多领域的深化改革举措也有望在新一年陆续亮相,这将带来A股“改革受益”概念的不断扩容。

其中,国企改革“破题”被认为有可能是最大的投资机会所在。周宁表示,通过改革盘活超过50万亿元的国企存量资产,增加国企经营效益对政府收入的贡献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机遇的同时,资本市场自身的改革也被认为是影响A股运行方向和品质的重要因素。一些业界专家呼吁,将“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至30%”纳入“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从顶层设计入手为股市和债市发展营造更良好的环境,令其更好发挥助推经济转型的作用。

而在建立市场化调节手段,改变供求失衡现状方面,新股发行注册制被寄予厚望。

华鑫证券投资总监仇彦英表示,2014年末的剧烈震荡显示,股市供求矛盾或正在加剧。管理层应通过合理调节供求关系,避免过热或过冷情况频繁出现损害股市生态。

但他同时表示,平衡供求关系不能依靠简单粗暴地增加股市发行和融资,而应充分利用当下的市场繁荣推进注册制改革,推动优质的和真正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在供给端加快养老金等大资金入市,通过改善投资者结构稳定市场。

与宏观经济相似,资本市场同样需要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人们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中国股市能真正承担起“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职能,成为承载国民财富梦想的平台。(据新华社)

新闻内容

1月两市限售股解禁 市值规模逾2500亿元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2015年首月,两市将有115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规模逾2500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1月份解禁的115家上市公司限售股合计解禁市值为2536.54亿元,较去年12月份增长9.81%。按解禁类型分,首发原股东限售股的解禁市值为1012.05亿元,股改、定向增发等部分的首发原股东解禁市值为1524.49亿元;按市场分,沪市公司解禁1388.4亿元,深市主板公司解禁226.99亿元,深市中小板公司解禁498.73亿元,深市创业板公司解禁422.42亿元。

以1月份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限售股解禁市值为126.83亿元,比12月份增长26.28%;以115家解禁上市公司计算,平均每家公司的解禁市值为22.06亿元,比12月份增长17.45%。

115家解禁公司中,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A股比例在30%以上的有61家,在100%以上的有29家,其中,比例最高前三家公司分别是海思科504.71%、利君股份465.15%、陕西煤业442%;限售股解禁市值在10亿元以上的有47家公司,解禁市值最大前三家是长江电力698.37亿元、海思科156.70亿元、陕西煤业153.15亿元。

115家解禁公司中,44家为创业板公司,合计解禁市值422.42亿元,占当月解禁市值的16.65%,为创业板成立以来单月解禁市值最高;解禁市值最高前三家是翰宇药业、国瓷材料、东方网力,解禁市值分别为58.39亿元、28.7亿元和28.54亿元。

115家解禁公司中,有36家为中小板公司,合计解禁市值498.73亿元,占当月解禁市值的19.66%,是2013年6月份以来最高;解禁市值最高前三家是海思科、利君股份、博彦科技,解禁市值分别为156.70亿元、78.97亿元、33.27亿元。(据新华社)



明州论坛

作为我市重大民生工程的宁波奥体中心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一期先行建设“三馆一园”,即体育馆、游泳馆、综合训练馆(全民健身中心)及体育公园,计划于2017年建成并投入运营(上月30日《宁波日报》)。

建设奥体中心是宁波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市民多年的期盼,可谓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毋庸讳言,不要说与国内同类城市相比,就是与省内杭州、绍兴等兄弟城市相比,我市的大型体育场馆设施也已明显落伍。现有规模最大的市级体育馆,还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宁波市体育中心,其规模、设施及功能,明显已无法满足举办大型赛事活动和市民休闲健身

百姓需要什么样的体育场馆

□徐川

的需求。大型体育场馆的缺失,不仅制约了我市文化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也与我市民生社会发展的水平及城市地位不相适应。奥体中心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市城市建设和体育事业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众多市民特别是体育爱好者的为之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人疑问:花巨资建设的体育场馆到底能为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实在好处?担心建成后的奥体中心会沦为中看不中用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抑或成为普通百姓难以涉足的“贵族俱乐部”。这些疑问和担忧并非多余。一般而言,综合性大型体育场馆的功能

多以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为主。一些场馆在完成大赛使命后被闲置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场馆虽没有闲置,但开放后的高收费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以致花费巨资建设的场馆利用率大打折扣,难以产生应有的效益,甚至成为政府的包袱。因此,一座新建的大型体育场馆,其功能如何定位,以及选择什么样的运营模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令人欣喜的是,我市新建的奥体中心并不以承办综合性大型赛事为主要目的,虽然其在设计上具有承接大型赛事和综合训练等功能,但主要目的还是服务我市全民健身,特别是一期建设的“三馆一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笔者以为,这样的定位是明智的。作为一

座大型体育场馆,奥体中心既是城市的标志和形象,更应成为面向百姓的公共文化设施,这是民生理念的体现。只有坚持这样的理念和定位,并在后期运营管理中妥善处理公益性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关系,放下身段,降低消费门槛,才能较好地顺应和满足百姓的需求,使之成为一座“接地气”的体育场馆。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其他一些地方大型体育场馆的覆辙,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和经济效益,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对现代文明城市而言,类似于奥体中心这样的大型体育场馆无疑是需要的,如果定位准确,管理运营得当,它在促进全民健身中的作用值得期待。但要真正推动全民健身

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健身需求,仅有一座奥体中心显然远远不够,因为任何一座体育场馆的服务半径及辐射力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规划建设体育健身场馆设施时,更多考虑如何满足老百姓就近健身休闲的需要。在建设奥体中心的同时,重视县(市)区级和街道(乡镇)级健身中心的规划建设,还要在社区、村落包括公园绿地,布局建设更多小型、简便的健身设施,让老百姓走出家门就能享受健身休闲之乐。如果把奥体中心这样的大型体育场馆比作月亮的话,那么那些遍布城乡各地的健身场地和设施就如同点点繁星,月亮和星星交相辉映,才能把全民健身的夜空装扮得璀璨绚丽。

用“职业化”减少消防员牺牲

□张贵峰

1月2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仓库发生火灾,着火仓库先后两次发生坍塌,火灾已造成5名消防战士牺牲,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的22岁,1996年出生的赵子龙,牺牲时刚刚入伍4个月(1月3日《新京报》)。

又见多名年轻消防员在火灾救援现场“出师未捷身先死”!据公安部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0起较大火灾中,有20多名消防员牺牲在一线;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牺牲在救火一线的消防人员超过140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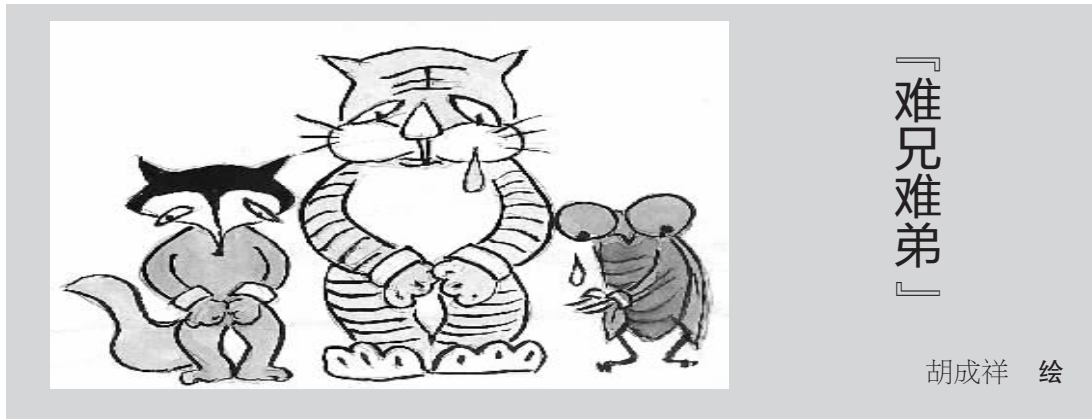
作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消防救难难免会有牺牲。但是,目前这种年轻消防员频频牺牲的现实,显然又并不完全是火灾本身的高风险造成的。从年龄上看,相比我国牺牲消防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美国牺牲消防官兵中位年龄达到了49岁”;从伤亡比例看,“挪威奥斯陆消防队,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名消防员在救火中殉职”,美国消防人员的伤亡比例为1:800,而“局部能看到的的数据显示,中国消防员伤亡比例大概在1:20”(据《上海法治报》)。

从数据对比不难发现,我国消防员之所以伤亡比例明显偏高,且集中

于20来岁的年轻消防员,显然与目前我国消防队员“职业化”程度不高、现役消防官兵为主体密切相关。一线消防队员主要由义务兵构成,服役期仅为两年,难免如专业人士所说,“20岁左右的新兵,很多基本没有接触过复杂火情,也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一些人刚刚积累点经验,又到了退役的节点”。

消防救难不仅高风险,也是“技术含量”和职业素养要求非常高的职业,圆满完成一次救火任务,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丰富经验。而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现实下,20来岁的年轻消防兵显然难以胜任。就像这次牺牲的赵子龙,年纪如此之轻,“入行”时间如此之短,如何在应对复杂火险险情中确保“全身而退”?况且,即使从消防救难效率的角度考虑,消防队伍主要由“职业化”程度有限的年轻消防兵组成,受经验局限,及时高效完成火灾救援任务的难度也很大。

在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中国,消防队员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承担的消防任务也会越来越重。因此,无论为了保障消防员自身安全、减少消防员频频牺牲的悲剧,还是为了提高救火效率、降低火灾损失,都应加快消防员“职业化”进程。



『难兄难弟』

胡成祥 绘

公共安全不可丝毫懈怠

□尹卫国

这几天,各地接二连三的安全事故,给新年笼罩上了悲恸气氛。上月31日子夜,上海外滩踩踏事故致36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撒手人寰;1月2日下午,哈尔滨一仓库火灾发生塌方,5名90后消防战士英勇牺牲,14人受伤;1月3日凌晨,云南大理一座600多年历史的明朝古城楼被火魔吞噬。

公共安全,是一道沉甸甸的责任考题。可以说,管理者及相关管理部门,每天24小时都在做“题”,只有时刻牢记责任重于泰山,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感、警惕性,不懈怠、不敷衍,勤勤恳恳做安全“守夜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公共安全风险。

落实公共安全责任,要善于发现和掌握事故发生的特征与规律,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如冬季气候干燥,就容易发生火灾;节假日公共场所人流量大,就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可能酿成事故的各种因素及规律心中有数,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主动、积极应对,就能排除安全隐患保障安全。

公共安全时刻不能懈怠,城市越大、越现代化,事故风险及管理难度就越大,对政府的要求就越高。随着春节临近,春运的启动,各类公共安全风险在增大,需要相关部门以更强烈的责任心去预防、控制和化解。

上海踩踏事故中的一位伤者说,如果提前在广场通往观景平台的台阶上设置铁护栏,隔离上下台阶人流,防止对冲,也许就能避免或减轻这起惨剧,迎新年外滩灯笼安保工作肯定是有预案的,遗憾的是这一细节被忽视了,换来的就是36条人命的教训,吸取血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许多人群聚集的场所,如重大文体娱乐活动的广场、旅游景区等,尤其是夜晚的群体活动,踩踏风险极高,决不可掉以轻心。

公共安全时刻不能懈怠,城市越大、越现代化,事故风险及管理难度就越大,对政府的要求就越高。随着春节临近,春运的启动,各类公共安全风险在增大,需要相关部门以更强烈的责任心去预防、控制和化解。

据人民网报道,临近退休的江西新余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频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人“打招呼”,大肆受贿千余万元。年前,其被江西省高院二审以受贿罪改判无期徒刑。在查实的受贿财物中,90%是在周建华自嘲为“二线职务”的人大主任任上收受的。

这个案子颇具代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像周建华在“二线职务”上被绳之以法的官员不乏其人,副部级以上的就有倪发科、郭永祥、陈柏槐、阳宝华等,省部级以下的更是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这些退居“二线”的官员被查,固然有因过去“屁股底下不干净”,被翻出“陈年老账”的,也有不少是换届、调任等原因离开重要岗位后,不甘寂寞,千方百计施展余威,为个人或亲朋好友谋取利益,导致晚节不保的。

“二线”官员“底线”失守引发腐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据中纪委监察部去年公布的案件数据显示,近年来被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至60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占总数一半以上,社会舆论还为此贴上了“59现象”的鲜明标签。按以往经验,这些官员普遍被认为是可以“安全着陆”的,如今却一个个倒下了。这说明,在中央“铁腕反腐”的高压态势下,“二线”并非“安全线”,“二线”一样有“风险”。

“二线”官员接连倒下,诱因不同,根源复杂。从主观上看,这些落马的“二线”官员普遍存在这样一些心态:一是失落心理。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退休在即,升迁无望,权力缩水,失落之下心态失衡。二是侥幸心理。有的官员过去碍于制度监管等因素,尚能洁身自好,一旦离开权力中心,反而变得无所顾忌,认为“再怎么反腐,也反不到自己头上”。三是铺后路心理。有的官员长期身居高位,颐指气使惯了,趁着捞点实惠,以便退休后依然能延续奢侈生活。

“二线”官员“在相对平静的河面上翻船”,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中国向来有“尊老”、“敬老”的官场文化,一些官员退居“二线”后,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特别是对那些在位时曾经提携、帮助过的下级、下级而言,“老领导”的话更是一言九鼎。再则,对于退居“二线”的官员,不少人怀有同情心理,即使他们犯了“错误”,通常也不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此外,“二线”官员往往被认为是“有职无权”,各方面的监督,也难免失之于宽。

习近平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可见,即使身处“二线”的官员,要想“平稳着陆”,也必须时刻自省、自警、自净,切莫心存侥幸,无视道德和法律“底线”,给自己和家人留下遗憾。组织也要加强对权力监管和约束,清除盲区、不留死角,从制度上有效防范和减少“泪洒黄昏路”悲剧的发生。

讣告

家父徐聘怀同志,原宁波市劳教所所长兼劳教学校校长,因病于公元2015年元月3日晚在家中逝世,享年88岁。兹定于2015年元月6日上午7时30分在宁波殡仪馆富寿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告亲朋好友。
联系电话:13818181315 13905745135
子:徐难看 徐卫东 泣告